

钟楼街史话之

涉事先贤不可轻

王继祖 王琛

7 崔嗣达

康熙《阳曲县志·卷十四·碑记》中，有一碑记曰《重修开化寺补缮藏经记》。此碑记中有“寺之开创五代唐，宋莫稽所自”之载，告诉世人开化寺的创年时代，顿释多少年来开化寺创建年代不详之说，而且说开化寺在有明一代两次重修，一次在“天顺丁丑”，即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一次在“嘉靖戊子”，即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初清康熙元年（1662）第三次重修又时隔“将百四十年”。

此碑文作者、阳曲人崔嗣达是明崇祯年至清康熙年、跨两个朝代、经三位皇帝、达三十余年间太原府阳曲县的著名乡贤，虽终生不曾入仕，却颇有声望，在康熙县志中，荣列入传。他家是一县之大族，其兄崔嗣远是明万历朝丙午科举人，先在太原府学任教谕，后为静海县知县，闯王李自成北伐明都，途经静海县时殉节明朝。一起赴死者，还有其妻。

崔嗣达其人为两朝拔贡，先为明崇祯年间拔贡，后为清顺治乙亥拔贡。所谓拔贡，是科举制度下，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尊称。

明末清初，六年贡一次，每府学二名，州县学一名，由行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择优保送入京，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崔嗣达虽两次考选为拔贡，但矢志不仕，以讲学著称。史说：“盖务博洽，理宗程朱。”“尤善诱进后学”“为古文，讲书课，文终身身”，饮誉省城。

康熙元年，巡抚杨熙捐资重修开化寺。杨是山西省最大官员，他捐资作榜样，众官谁敢作壁上观，纷纷仿效。“经历四年，方克告竣”“一切新增厘旧，次第就理”。而且，补缮《大藏经》所失。待开化寺修葺一新、补缮经典后，杨巡抚请人品文章均佳，在府、县均有声望的崔嗣达撰写《四修开化寺补缮藏经记》。崔嗣达欣然命笔，扬扬洒洒，妙笔生花，撰成记文后，又镌之于石，完成了他与开化寺、钟楼街的一段奇缘。

过往不少写开化寺的文章，大多没有读崔拔贡所撰之文，以人云之，己亦云之；人讹之，己亦讹之，以致谬迹流传。如认真拜读崔拔贡关于重修开化寺及补缮藏经之碑记，则自然纠谬勘误，善莫大焉。

9 南桂馨

清朝末年，省城太原行商坐贾积极活动，以败破难撑的开化寺作为开商铺、立字号的好地方。开化寺僧人身居闹市，六根怎能清净，遂积极拆卖庙产，租赁作商铺。先是在寺庙的后院菜园、柴场与商家合伙或建或搭，成为临街、临建的商市。太原辛亥起义后，1913年，省城商人更是乘势而上，在开化寺的北部开辟市场，取名“共和市场”。老百姓则依习惯形势，直呼其为“新开化寺”。

山西军政府成立后，山西辛亥革命元老、都督府粮服局局长南桂馨抓税赋，促商业。南桂馨则力主采取“打钟寺”改“大中市场”的路子，彻底改造开化寺为“开化市场”。

南桂馨，字佩兰，出自富庶之家，幼入私塾，虽机敏，但不喜读书，热衷于交朋结友，甚喜社会活动。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留学日本返归故乡宁武的同盟会员丁致中、谷思慎的影响下，加入同盟会山西支部，成为革命党人。1911年10月29日，姚以价率众打响太原辛亥义举第一枪，太原光复后，南桂馨被委任为阎氏政权的“军需大臣”。

1920年，南桂馨牵头集资组建“新化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吸引商界、政界、军界等各行各业有经济实力的人，参与“开化寺”改“开化市场”的工程。为什么要给这个公司取名为“新化”？据说，在早期考察中，南氏发现当年的“共和市场”名头并不响亮，老百姓叫的“新开化寺”却尽人皆知，遂打起顺乎民意的“靓招”，将“新开化寺”之称浓缩为“新化”，做了公司的名字。

南桂馨牵头的这项改建工程，将古刹开化寺破损、危摧以及不能使用的殿堂、房舍全部拆光，只留下最西边的偏院和尚好的殿堂继续使用，并将原“共和市场”连同新建的市场，并作一个大市场，名字就叫“开化市场”。新建的“开化市场”总面积12000平方米，用时仅仅一年，1921年正式开业。南桂馨以“开化市场”的创建人与钟楼街史话结缘。

敬启：《钟楼街史话》系列文章至此结束，感谢读者关注！

8 刘占元

阳曲县商人刘占元是“大中市场”的创建者，不少资料 and 文章异口同声说，辛亥年九月初八（1911.10.29）太原新军起义后，建立了新的政权“山西军政府”，而就在军政权成立的当天傍晚，溃败的乱军抢劫打钟寺商家，为毁灭证据，放火烧毁了古老的寺院和在寺院开办的商铺，打钟寺成为一片火后瓦砾废墟，只有康熙初年创建的千佛阁幸免于难。

1913年，商人刘占元看到当年的闹市打钟寺虽成一片废墟，但地处太原城黄金地段，一旦开发出来寸土寸金，是商家发展的宝地，遂不惜重金，召集同道，集资集股，

成立了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在打钟寺的故址上建起了一个中西结合的两层式楼群，仍取古寺龟形之状，称“大中市场”，为钟楼街百年商市首先开河立下大功。

关于刘占元身世，鲜见于记载，幸见到刊于报端的孙琨作品《大中市传奇》，有一段简述说：“在阳曲北塔地村和南郑村之间一个叫桥沟的地方，有一座当地人称曾经占地千亩的刘氏庄园……现在还有依土梁而建的刘占元故居，一座残存的古堡。从地面到顶层有四层建筑。”方知刘占元是民国阳曲县二区23个主村（行政村）之一北郑村所属的自然村桥沟人。现在桥沟已不是村社，是归属北塔地村还是南郑村，不详。

连载

相信此次广泛征求各方意见而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许宏所徒叹奈何的“尸乡沟商城遗址”问题有可能得到纠正；“二里头夏都博物馆”违规命名的“夏都”能够予以更正。

文化遗址名也是地名，是发掘地之名，是文化属性的代号、指称；地为实，名为表。遗址名离开发掘地，便无所依；发掘地离开出土物，就无所指。1959年1月19—26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建设的伟大成就，科学院考古所与文化部文物局在京举行了为期八天的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座谈会。即便是在考古学中大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当时，尹达和夏鼐也对考古遗址的定名问题发表了影响至今的讲话及由夏鼐定下的三条命名原则。

尹达的意见是：“旧有的名称如果并不引起误解的，可以保留使用；否则可以考虑另起一个新的名称。这种新的名称以及新发现的各种文化的名称如何命名，似乎可以采用最通行的办法，便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迹）的小地名为名。”

夏鼐的看法为：“‘命名’的原来目标，是想用简单的名称来充分表示一种特定的含义。使用时大家互相了解，不致引起误解。命名的适合与否，似乎可以用这个标准来判断。以族名来命名的办法，只能适用于较晚的一些文化，并且须要精确的考据；否则乱扣帽子，产生许多谬误，反而引起历史研究的混乱。除非考据得确实无疑，否则最好仍以小地名命名而另行指出这文化可能属于某一族……如果还不具备一种文



51

苏
华
著

■ 作家出版社

《大夏禹都》节选

化类型所应有的条件，而我们看到某些片面的个别的现象，就匆匆忙忙地给它一个新的名称，那就未免有些冒失了；这就会造成一些不应有的混乱，因而使古代社会的研究工作发生不必要的纠纷。根本问题在于对古代文化遗存的实事求是的

科学分析。在这里踟躇不前是不好的，轻率浮夸更是要不得的。考古工作者对于文化的命名问题，应当具有严肃的科学态度。”

回首夏鼐在世时对考古人在定名上的忠告，考古人栉风沐雨，风餐露宿，诚如王安石诗句“冉冉春行暮，菲菲物竞华”，面对着自己发掘出的遗址，砥节立名，或今地名+遗址名，或古地名+遗址名，显出一派规整清晰的习习和风。然而，随着一代学贯中西的考古学家逝去，一切一切都变了，故址疑梦，妍媸毕露——从第四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起，突破命名原则底线的不规范的命名一个接着一个地出现。遵守和继承夏鼐对考古发掘遗址以小地名定名原则的是许宏；敢于公开批评数处遗址命名错

误的是许宏；写出专题论文讨论国保单位先秦城址命名不规范的也是许宏；对“郑亳说”和二里头“西亳说”这类推论持不同意见的还是许宏！在遗址命名问题上，他说：“依考古界约定俗成的惯例，遗址命名应以遗址所在地的小地名为准，以能精确反映遗址所在位置为宜，否则就会出现不同遗址有相同命名的情况。所谓小，是相对省、县级行政区划来说的，一般是遗址所在的村庄名，或者当地人对某村辖地内一处更小地方的称呼。”

仅靠历史文献推论“夏都”在何处的不确定性，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徐旭生寻找“夏墟”，却认为考察的二里头遗址是灭掉了夏的第一代商王的都城。